

第十册

癸陽鄭氏碑
泰山經石峪
匡喆刻經頌

楊守敬集

主編

謝承仁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楊守敬集

一



●

謝承仁 主編

第十冊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楊守敬集編輯委員會

主編

謝承仁

編委

于 洸 王永瑞

邱久欽 李楚興

林培黎 郝志群

陳金安 陳建堂

馮方華 婁齊貴

楊中岳 楊傳緯

齊世榮 蔡學儉

劉鼎華 盧福咸

(以上按姓氏筆畫爲序)

項目責任編輯

李爾綱

祝祚欽

李作君

胡治洪

本冊責任編輯

李作君

封面設計

汪 漢

技術設計

萬超彬

杜義平

余兆偉

本冊責任校對

和曉玲

楊守敬集

第十冊



熒陽鄭氏碑

〔一〕

泰山經石峪

〔二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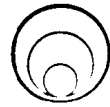
匡喆刻經頌

〔四〇九〕

熒陽鄭氏碑

伍躍整理

目次



前言	〔五〕
熒陽鄭氏碑序	〔十一〕
鄭道昭《鄭文公上碑》	〔十五〕
鄭道昭《鄭文公下碑》	〔三一〕
鄭道昭《論經書詩》	〔七二〕
鄭道昭《觀海童詩》	〔一四〕
鄭道昭《雲峰山題字》	〔二七〕
十五種	〔二四八〕
鄭道昭《大基山詩刻》	〔二八八〕
鄭道昭《大基山題字》及 《銘告》十一種	〔二七四〕
鄭道昭《天柱山題字》三種	〔二〇四〕
鄭述祖《重登雲峰山石刻》	〔二一四〕
鄭述祖《天柱山銘》	〔二三四〕
鄭述祖《題雲居館石刻》	〔二三七〕
附錄 原書所輯題跋	
十八則	〔二三七〕

前言

《熒陽鄭氏碑》，楊守敬編並序，日本著名書法家日下部東作刻於明治十四年（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十冊。該書收錄了鄭道昭、鄭述祖父子二人的三十八件書法刻石。計：

鄭道昭（三十五件）：

《鄭文公上碑》^①

《鄭文公下碑》

《論經書詩》

《觀海童詩》

《雲峰山題字》十五種

《大基山詩刻》

《大基山題字》及《銘告》十一種

《天柱山題字》三種

鄭述祖（三件）：

《重登雲峰山石刻》

《天柱山銘》

《題雲居館石刻》

魏晉南北朝時期，熒陽鄭氏在中央並沒有掌握實際權力，但在地方上卻有較大的勢力，是與清河崔氏、範陽盧氏、隴西李氏等齊名的世家大族。據有關史書及《鄭文公碑》記載，鄭義的家系大致為：

渾——□——□——□——□——豁——溫——暉

白驊
小白
洞林
叔夜
連山
義

懿

道昭

嚴祖
敬祖
述祖
遵祖
順祖

鄭義(四二六—四九三年)為鄭暉第六子,字幼麟。《魏書·鄭義傳》稱:「義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他很早就進入了統治集團。特別是在北魏孝文帝時,鄭義不僅與孝文帝的寵臣李冲結為兒女親家,而且由於他的女兒被孝文帝納為嬪,從而加強了他與鮮卑貴族的聯繫。因此,聲勢愈加顯赫。他倚仗權勢,「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甚至公然經商牟利,「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饗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所以,他死後被諡為「文靈」,以「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

鄭道昭(?—五一五年)為鄭義次子,字儋伯,自號中岳先生、嵩岳先生。據《魏書》記載:「昭少而好學,綜覽群言」。憑借父輩的蔭庇和自己的文才,昇遷較快,「初為中書學生,遷秘書監,拜主文中散,從員外散騎侍郎、秘書丞兼中書侍郎」。他曾多次向鮮卑統治者建議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晚年出任平東將軍、光州刺史,後轉青州刺史。他任二州刺史時,「政務寬簡,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同時,他還在雲峰山、天柱山、大基山等處(今山東平度縣、掖縣境內)留下了許多書法刻石,即磨崖石刻。其中除為其父頌揚功德的《鄭文公碑》之外,還有一些記遊之作。

鄭述祖(生卒年不詳),鄭道昭第三子,字恭文。《北齊書·鄭述祖傳》說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稱譽。釋褐司空行參軍」。北齊文宣帝天保初年,「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河清—天統年間(五六二—五六五年),他任光州刺史時,也在雲峰山、天柱山等處留下了一些書法作品。

鄭道昭、鄭述祖父子二人的書法刻石分佈在膠東半島的群山之中。由於地處僻壤,自宋代趙明誠在《金石錄》中對《鄭文公碑》、《天柱山

銘》等有過簡要的著錄外，此後數百年間鮮為人知。這樣，這些珍貴的石刻幸免捶拓損毀以及其他災變破壞。直到清代中葉，才陸續被重新發現，並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注意。著名學者錢大昕、阮元、汪鋈等人對這些石刻進行了著錄和考釋。書法藝術愛好者對之大加推崇。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一書中即將《鄭文公碑》譽之為「文苑奇珍」。另外，張錡、吳熙載等人也是極力稱頌。

鄭道昭的書法藝術能被人如此推許，并非偶然。

魏晉南北朝幾百年間，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大動蕩時期，也是民族融合促進民族文化大發展的一個時期。在漢字發展史上，這時也是一個重要的時期，從東漢時逐步形成的真、行、草諸種字體，到此時已基本定形。字體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書法發展的結果，而這種字體的變化，又反過來使書法藝術呈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在這一時期的書法界，楷、行、草、隸、篆各種字體同時發展，各極其妙，在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形成了一個「光前裕後，繁花似錦」的時代^②。書法作為一門藝術已被社會承認，在不同的階層中都湧現出一批書法藝術家。唐人竇泉在《述書賦》中列舉了二百零七位書法家，屬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就有一百四十五位。由於當時南北方在社會狀況以及經濟、文化發展上的某些差異，因而書法藝術的發展在南北之間也呈現了某種程度的差異。阮元在《南北書派論》中認為：「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啟牒」，「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榜」。他以為「兩派判若江河」^③。阮元這種將南北書法藝術某些差異絕對化的看法，曾有不少人提出異議。如楊守敬在《學書邇言》中就明確指出：「雲峰山鄭道昭諸碑，道勁奇偉，與南朝之《瘞鶴銘》，異曲同工。」實際上，南北方在政治、軍事上的對立，並沒有使南北之間的文化交流完全中斷。南北雙方的書法藝術雖各有其特點，但卻是在相互影響之中發展起來的。

在南北朝的書法藝術中，鄭道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北碑的書法流派大致有三：（一）方筆斬截，結體扁方緊密者（此種號為正宗）；（二）用筆方圓兼備，體勢漸趨方正，且時見縱藝者；（三）圓筆雜糅諸法，結體多變者^④。鄭道昭就是第二類的突出代表。馬成名曾用十六個字概括了鄭道昭在書法藝術上的特點：「筆力矯健，結構新奇，氣勢磅礴，雄偉多姿。」^⑤包世臣曾說：「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⑥。康有為盛讚《鄭文公碑》為「圓筆之極軌」^⑦。今人陳玉龍認為：「此碑（按：指《鄭文公碑》）結字疏朗俊逸，氣度凝重渾穆，給人以雄強之感。它既有篆隸之勢，復具分隸之雅，更饒草書之情理，兼美具備，萃衆長於一碑，堪稱佳構」^⑧。在現存魏晉南北朝的書法藝術作品中，《蘭亭序》早已難見真蹟，《瘞鶴銘》雖尚存數十字，但多已剝蝕不清，惟有鄭氏父子的書法刻石至今還較好地保存下來，特別是像《鄭文公碑》這種千餘字的鴻篇巨製字字保存完整，這是極難得的。正因為如此，鄭道昭的作品不僅是書法藝術寶庫中的精華，也是研究文字發展的珍貴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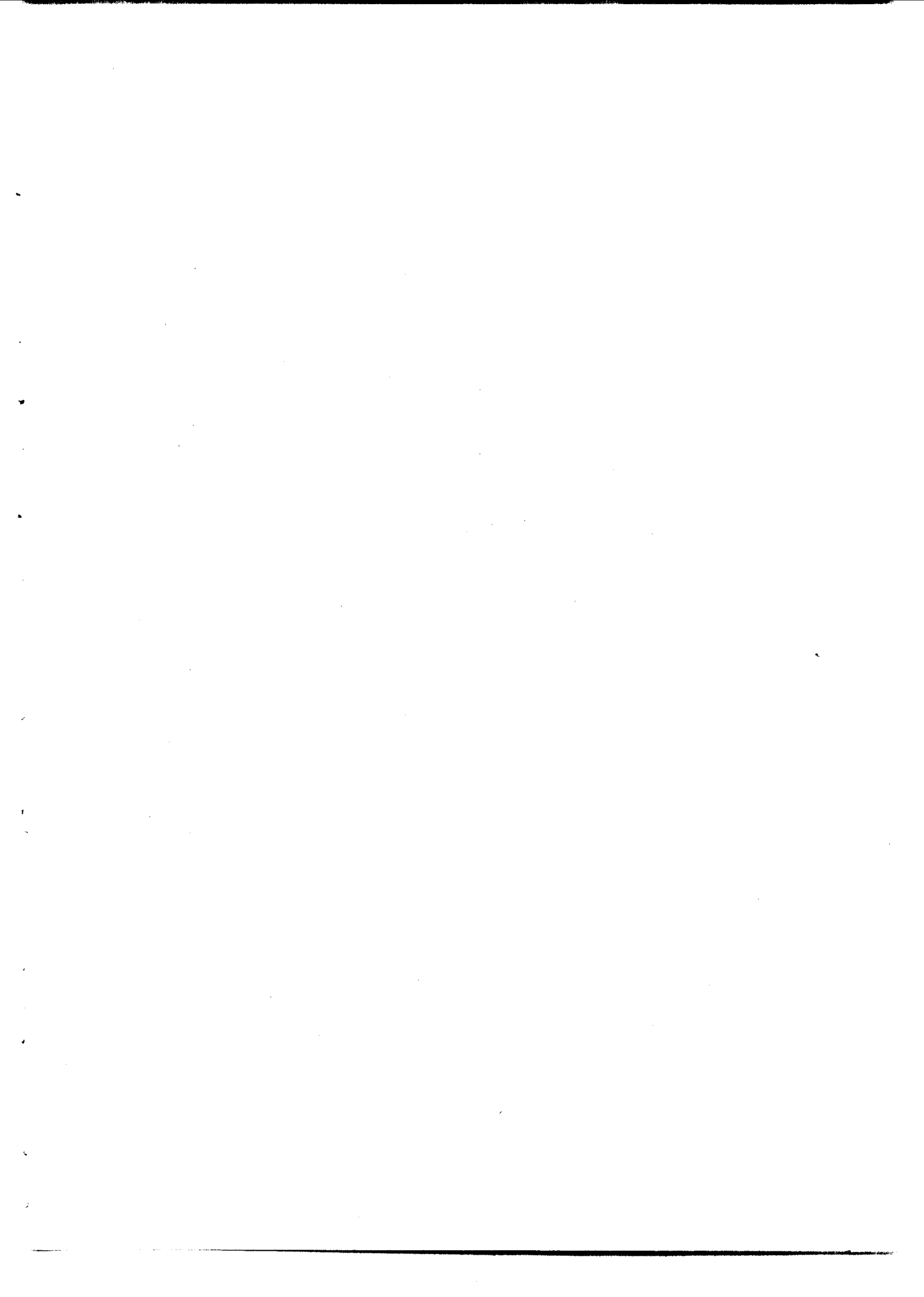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學者在研究鄭氏父子書法藝術的同時，還利用這些摩崖石刻考訂、補充史書的記載。他們注意的問題主要有：

一、鄭義的諡號

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宋人趙明誠。《魏書·鄭義傳》記載：鄭義的諡號為「文靈」。但《鄭文公碑》碑額卻題為「文公」，碑文內則說「加

此書所收三十八種鄭氏碑均為摩崖刻石，年代久遠，風雨剝蝕，漫漶尤甚。而所傳歷代拓本存字多寡亦有不同。楊守敬雙鈎這些碑時，一些無法辨認的字就沒有鈎出，也未標示□。日下部東作付梓時亦相延這種格式，從而造成雙鈎本中前後字有時不能構成文句，難以卒讀。此次印制出版，照原樣予以保留。

- ① 本碑和《鄭文公下碑》即《魏故中書令、秘書監、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南陽文公鄭義之碑》，碑額為《滎陽鄭文公之碑》。上碑在天柱山，下碑在寒同山。對此二碑向來無統一稱呼。本文為敘述方便，一律稱此二碑為《鄭文公碑》。
- ② 馮亦吾《書法探求》。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 ③ 阮元《瑯經室三集》卷一。清道光三年儀徵阮氏文選樓刻本。
- ④ 鐘明善《中國書法簡史》。河北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 ⑤ 翟本寬《試論河南書法藝術在中國書學史上的地位》。《鄭州大學學報》，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 ⑥ 包世臣《藝舟雙楫》卷三。清道光二十六年白門倦游閣木活字本。
- ⑦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餘論第十九》。清光緒十九年南海康氏萬木草堂刻本。
- ⑧ 陳玉龍《南銘之冠與北碑之冕》。《文史知識》，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 ⑨ 參見附錄《中書令鄭義下碑》及鄭述祖《天柱山銘》。
- ⑩ 參見附錄《中書令鄭義下碑》。
- ⑪ 同⑩。
- ⑫ 參見附錄《鄭道昭雲峰山題字》十五種。
- ⑬ 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民國四年石印本。
- ⑭ 楊守敬《學書邇言》，第四四——四五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熒陽鄭氏碑序

原夫文皇^①右文，好弄柔翰，金匱玉軸，球圖鐘玉。而崔、盧^②寸楮，不登秘府，故竇泉《述賦》^③，偏重南朝。然自典午以來^④，碑禁綦嚴，巨鳳豐材，多樹北土，絹素之年不如貞砥之壽，墨箋散佚，氈蠟斯多，亦循環之理也。顧歐、趙著書^⑤，筦籥經史，筆札優劣，例不兼稱。中原劇蹟所特珍者，惟道護一人與《龍藏》一碑^⑥。良由《昇元》^⑦以降，棗木集帖，家置一篇，沾溉既深，心目為轉，雖有博綜，非所習聞，苟免詆謫，已稱通學。浸假至于勝國文、董^⑧之儔，名高一代，侈談黃麻，莫悟粉本，目不覩韓陵片石^⑨，自詡會稽如面，良可嗤也！我朝魁碩輩出，事必師古。乾嘉以還，搜索名山，樸質古情，始啟緘祕。迺知《潭》、《絳》、《汝》、《利》^⑩，遞經祖述，既悲神喪，又覺形離，問途八法，舍吉金樂石，莫窺蹊徑。而熒陽鄭氏諸碑，照耀青州，尤稱偉麗，典型百世，夫何間然！而論者持北碑南帖之說，為古質今妍之分，擬諸琅玕《保母》^⑪，焦山《瘞鶴》^⑫，非唯不克專長，竊恐未足方駕。

余弱冠之年，留心采輯，徘徊相國之寺^⑬，摩挲祝融之峰^⑭，寒暑代更，筐篋略富。唯斯碑遠在東國，結架稱難，天柱蒼封，險等懸度。而余鑿空振奇，不留餘憾，竭精所致，遂多於前賢。乃踵其步趨，別為副本。庚辰之夏，攜之東度。日下鳴鶴流目心醉^⑮，堅求付梓，迪厥後生。刻期鳩工，殺青斯竟。

夫以斯碑之在中土，高崖豐隆，千人瞻仰。而德甫著錄以後，久寂聲聞^⑯。斯固顯晦有時，亦前修搜求之略也。日本古昔所齎，大抵李唐以下，元魏楷法，夢寐不親，宜其入主出奴，情同枘鑿。而鳴鶴瞥然一瞬，忽焉契合，稱斯妙製，永播芳徽，可謂神解獨運，捷於轉環矣。抑余更有進者，景伯《隸釋》先覺良規^⑰，而展轉覆刊，魯魚接踵，原石解散，十不存三，訂訛鉅謬，久絕證驗，再經風雨，必更銷沈，每欲即今所存盡援斯例留厥真影，庶崔、蔡遺則^⑱，模範愈延。而力少願奢，落落難合，世之君子，其亦有樂於斯？

光緒辛巳春二月十九日，荊州楊守敬撰並書。

此《碑》「熒陽」字皆從「火」。案《周禮·職方氏》：「其川熒雒。」注：「熒，在熒陽。」漢《韓勅後碑》^⑲、《劉寬碑》^⑳、

《鄭烈碑》②「榮陽」字亦從「火」。下至唐盧藏用書《紀信碑》猶然②。然則《禹貢》之「榮波既滌」，及《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所載「榮陽」字皆傳寫之誤。諸碑異文甚多，此字尤關經義，故附記之。

- ① 文皇：指唐太宗。《宋史·寇準傳》：「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 ② 崔、盧：指崔悅、盧諶。崔悅（生卒年不詳），晉清河人。盧諶（二八四—三五〇年），晉範陽人。二人仕於後趙，並以博學齊名。悅法術理，諶宗鑑錄，且俱習家譜之草書，在北魏初年名重一時。
- ③ 寶泉：生卒年不詳，唐扶風人，字靈長。官至檢校戶部員外郎。工書，尤精草隸。嘗作《述書賦》，精窮旨要，詳辨秘義。綜論唐中葉以前歷代書法家二〇七人。
- ④ 典午：「典」，掌管，與「司」同義，「午」，十二屬相中為「馬」。故以「典午」稱司馬氏之晉朝。
- ⑤ 指歐陽修、趙明誠。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年），宋吉水人，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卒諡文忠。修雖以文章著名，書法亦超拔流俗，自成一派。撰《集古錄》十卷，收錄五代以前的金石文字，頗多考證，為我國現存最早著錄金石的著作。趙明誠（一〇八—一一二九年），宋諸城人，字德父。工金石之學，與妻李清照就家中所藏三代彝器及漢唐以來石刻，仿《集古錄》撰《金石錄》三十卷。
- ⑥ 道護：指丁道護（生卒年、籍貫不詳），隋文帝時人，官至襄州祭酒從事。善正書，且頗得漢魏遺法，方嚴道勁，著名於隋、唐之際。「龍藏」：指《龍藏寺碑》，即《恒州刺史鄂國公為國勸造龍藏寺碑》，正書，隋開皇六年（五八六年）立，張公禮書，在今河北正定縣龍興寺內。該碑書法中和寬博，屬隋碑中之上品。
- ⑦ 《昇元》：叢帖名。南唐後主李煜令徐鉉據秘府珍藏所刻。因卷末有「建業文房之印」，故一名《建業文房帖》，又因置於澄心堂，故亦稱《澄心堂帖》。
- ⑧ 宋周密《雲烟過眼錄》載儲伯秀語：「江南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前代墨蹟、古今法帖入石，名曰《昇元帖》。」
- ⑨ 文、董：指文徵明、董其昌。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年），明長洲人，初名璧，後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居士。官至翰林院待詔。詩文、書畫皆工。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年），明華亭人，字玄宰，號香光。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諡文敏。工詩文、書畫，書法初宗米芾，後自成一派，瀟灑生動。
- ⑩ 韓陵片石：韓陵山在今河南安陽東，北魏高歡敗爾朱氏於此。後立碑於定國寺旌功，溫子昇撰碑文。唐張鷟《朝野僉載》卷六：「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庾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惟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
- ⑪ 《潭》、《絳》、《汝》、《利》：指四種較有影響的法帖。《潭帖》，北宋慶歷年間，劉沆任官潭州，命釋希白據《淳化閣帖》摹刻於石，且略有增補，共計十卷。《絳帖》，北宋淳化三年（九九三年），潘師旦據《淳化閣帖》等刻於絳州，共二十卷。《汝帖》，北宋大觀三年（一一一三年），汝州郡守王象集古碑、古刻中字摹刻於石，凡十二卷。因編輯謬誤，為宋刻法帖中的最下品。《利帖》，北宋元祐七年（一一〇九年），劉次莊據《淳化閣帖》等刻於臨江戲魚堂，共十卷。世稱《臨江帖》或《戲魚堂帖》。南宋慶元年間，權安節重刻於利州，故又稱《利帖》。

⑪ 琅玕《保母》：指晉王獻之所書《保母李如意墓志》。南宋嘉泰二年（三〇二年）出土。正書，書法古雅。有人以為此志為偽造。「琅玕」，王獻之之郡望。

⑫ 焦山《瘞鶴》：指《瘞鶴銘》——南北朝時期書法藝術的優秀作品。原題「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對該碑的作者及鐫刻年代，歷來衆說紛紜。一說為梁陶弘景書，天監十三年（五一四年），刻於焦山西麓。後因山崩墜入長江，裂為五塊。清康熙初年始打撈出水。現殘存九十餘字。

⑬ 相國之寺：在今開封。始建於北齊天保六年（五五五年），時稱「大相國寺」，後毀。唐睿宗時重建。改稱「相國寺」。北宋至道二年（九九六年）擴建後，更名為「大相國寺」。

⑭ 祝融峰：南岳衡山的最高峰，海拔一二九〇米，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山上所存歷代石刻及其他古蹟頗多。

⑮ 日下鳴鶴：即日本著名學者日下部東作（一八三八——一九三二年），字鳴鶴。楊守敬在日本期間，曾與之交遊甚密，共同研討版本、目錄之學及書法藝術。

⑯ 德甫：即德父，趙明誠字。

⑰ 洪適：字景伯（一一一七——一一八四年），宋吉水人，號盤洲老人。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封魏國公，謚文惠。喜收藏金石拓本，並據之訂證史傳訛誤。作《隸釋》二十七卷，著錄歷代碑刻一二九種，考辨精詳。今傳本殘缺不全。已非原本之舊。

⑱ 崔、蔡：指崔瑗、蔡邕。崔瑗（七七——一四二年），東漢涿郡人，字子玉。官至濟北相。善章草，人稱「草聖」。蔡邕（一三二——一九二年），官至左中郎將，少博學，工書畫，創八分書，參與校定六經文字，並親自書丹於碑。

⑲ 《韓勅後碑》：即《韓勅修孔廟後碑》，無額。東漢永壽三年（一五七年），立於山東曲阜，隸書。韓勅（生卒年不詳），字叔節，永壽間曾為魯相。

⑳ 《劉寬碑》：即《漢故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連鄉昭烈侯劉公之碑》。東漢中平二年（一八五年）由劉寬故吏李謙立於雒陽上東門外，隸書。劉寬（一一〇——一八五年），字文饒，弘農人，仕東漢，官至太尉。

㉑ 《鄭烈碑》：即《晉故右軍將軍、平羌僊侯鄭府君之碑》。晉太康四年（二八三年）鄭烈故吏申揚等立，隸書。鄭烈（二三八——二八二年），滎陽人，字休林，仕晉，官至拜議郎。

㉒ 《紀信碑》：即《漢忠烈紀公碑》。唐長安二年（七〇二年）立於滎陽，隸書。唐盧藏用撰並書。紀信為漢高祖功臣，此《碑》為追思其功德而立。